

清宮武備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清宫武备



主编：徐启宪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清宫武备

Armaments and Military Provisions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 主 编 徐启宪
副主编 毛宪民 曹连明
编 委 恽丽梅 刘立勇 秦凤京
摄 影 刘志岗
- 出 版 人 陈万雄 胡大卫
编辑统筹 张倩仪
- 编辑顾问 吴 空
责任编辑 徐昕宇 黄 东 周祖贻
设 计 张婉仪
-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71 号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湾耀兴道 3 号东汇广场 8 楼
- 制 版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8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繁体版）
©20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简体版）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 规 格 大16开 (216 × 286mm) 292 面
国际书号 ISBN 978-7-5323-9551-4/J-92

版权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区，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图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本版图书仅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Condition of sale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distributed in Mainland China only.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特邀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襄	王 尧	李学勤
张政烺	金维诺	宿 白

总编委主任委员：郑欣淼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杜迺松	李 季	李文儒
李辉柄	余 辉	张忠培
邵长波	陈丽华	杨 新
杨伯达	单国强	郑珉中
郑欣淼	胡 锤	施安昌
耿宝昌	晋宏逵	徐邦达
徐启宪	聂崇正	萧燕翼

主 编： 李文儒 杨 新

编委办公室：

主 任： 徐启宪

成 员：	杜迺松	李辉柄	余 辉
	邵长波	陈丽华	单国强
	郑珉中	胡 锤	施安昌
	秦凤京	郭福祥	聂崇正

总摄影： 胡 锤



总序

杨新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占地72万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万件。

公元1406年，明代永乐皇帝朱棣下诏将北平升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旧宫的基址上，开始大规模营造新的宫殿。公元1420年宫殿落成，称紫禁城，正式迁都北京。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国统治，仍建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内。按古老的礼制，紫禁城内分前朝、后寝两大部分。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辅以文华、武英两殿。后寝包括乾清、交泰、坤宁三宫及东、西六宫等，总称内廷。明、清两代，从永乐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仪，共有24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这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1914年，北洋政府将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部分文物移来，在紫禁城内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1924年，溥仪被逐出内廷，紫禁城后半部分于1925年建成故宫博物院。

历代以来，皇帝们都自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他们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视作自己的财产。因此在宫廷内，不但汇集了从全国各地进贡来的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精品和奇珍异宝，而且也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匠师，创造新的文化艺术品。中间虽屡经改朝换代，宫廷中的收藏损失无法估计，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土辽阔，历史悠久，人民富于创造，文物散而复聚。清代继承明代宫廷遗产，到乾隆时期，宫廷中收藏之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度侵入北京，横烧劫掠，文物损失散佚殆不少。溥仪居内廷时，以赏赐、送礼等名义将文物盗出宫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1923年中正殿大火，清宫文物再次遭到严重损失。尽管如此，清宫的收藏仍然可观。在故宫博物院筹备建立时，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其所藏进行了清点，事竣后整理刊印出《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六编28册，计有文物

117万余件（套）。1947年底，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其文物同时亦归故宫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战火的毁灭，故宫博物院从大量的藏品中检选出器物、书画、图书、档案共计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运至上海和南京，后又辗转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文物复又运回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2972箱于1948年底至1949年被运往台湾，50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运返北京，尚有2211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于南京建造的库房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的体制有所变化，根据当时上级的有关指令，原宫廷中收藏图书中的一部分，被调拨到北京图书馆，而档案文献，则另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藏保管。

50至60年代，故宫博物院对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进行了清理核对，按新的观念，把过去划分“器物”和书画类的才被编入文物的范畴，凡属于清宫旧藏的，均给予“故”字编号，计有711338件，其中从过去未被登记的“物品”堆中发现1200余件。作为国家最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肩负有搜藏保护流散在社会上珍贵文物的责任。1949年以后，通过收购、调拨、交换和接受捐赠等渠道以丰富馆藏。凡属新入藏的，均给予“新”字编号，截至1994年底，计有222920件。

这近百万件文物，蕴藏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极其丰富的史料。其远自原始社会、商、周、秦、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历五代两宋、元、明，而至于清代和近世。历朝历代，均有佳品，从未有间断。其文物品类，一应俱全，有青铜、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书名画、印玺、漆器、珐琅、丝织刺绣、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皿、文房珍玩、钟表、珠翠首饰、家具以及其他历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可以说这是一座巨大的东方文化艺术宝库，不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艺术的历史发展，凝聚着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

开发这座宝库，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为社会提供了解和研究这一传统的可信史料，是



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去我院曾经通过编辑出版各种图书、画册、刊物，为提供这方面资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各科学术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种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故宫文物以一窥全豹的出版物，由于种种原因，尚未来得及进行。今天，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故宫。学者专家们，无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还是从事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也都希望从故宫的藏品中发掘资料，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因此，我们决定与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统地反映故宫文物收藏的大型图册。

要想无一遗漏将近百万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数十年内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考虑到社会需要的同时，不能不采取精选的办法，百里挑一，将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来，约有一万二千余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这需要八至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可以说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六十卷的体例，我们采取按文物分类的方法进行编排，但是不囿于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与宫廷历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文物，则采用特定主题的编辑方法。这部分是最具有宫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们所忽视，而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今天，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历史价值。另外，对某一类数量较多的文物，例如绘画和陶瓷，则采用每一卷或几卷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编排方法，以便于读者的需要和选购。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务是艰巨的。为此我们动员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内老一辈专家和聘请院外若干著名学者为顾问作指导，使这套大型图册的科学性、资料性和观赏性相结合得尽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务由中、青年人承担，其中的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因此当我们刚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时，诚恳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和建设性意见，使以后的各卷，能达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忠诚合作！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们进行这一事业的人们！

1995年8月30日于灯下

导言

徐启宪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百万件文物中，清代宫廷武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数量之丰富、工艺之精湛、材质之优良，是国内其他博物馆藏品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武备文物，大部分是清代皇帝御用品，也有少量皇室成员、侍卫亲兵和八旗军兵之物，主要包括冷兵器和热兵器两大类。若按《大清会典》之规定，则分为甲冑、弓箭、刀剑、马鞍、囊鞬、枪炮、旗纛、海螺、金鼓、藤牌、战舰及传统兵器等几类。它们具有时代跨度长，体系完整的特点，是清代政治、军事以及帝王宫廷生活的缩影，为认识和研究清代政治、军事、典章制度、宫廷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本卷从中拣选了二百八十六件（套）具有代表性的珍品，主要以用途、种类和时代为序牖陈，期望能使广大读者对清宫武备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清代皇帝对武备的重视

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是一支以围猎为主的游牧民族，世代活动于中国东北的高寒地带。满族的民族特点即是“国语骑射”。所谓“国语”即满语；骑射即能在骑马奔驰中射箭中的（箭靶的中心），它是满族长期狩猎生活中的民族特技。清初诸帝如皇太极、康熙、乾隆等人无不精于骑射，为使满洲皇室贵族、王公大臣不因生活安逸而忘本，丧失尚武之精神，也为保持八旗军兵的战斗力的战斗力，他们非常重视武备，经常举行各类军事活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操阅军队和骑射围猎。

其一、大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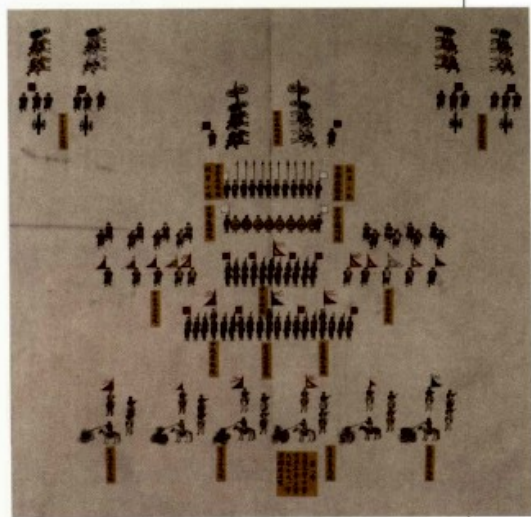
皇帝亲自检阅八旗部队，观看各兵种列阵操练和演练武器，称为大阅。这一军事活动，在清朝入关前就已开始。如太宗皇太极时，天聪六年至八年（1632—1634年），连续三年在沈阳

北郊举行大规模阅兵演武活动。入关后，顺治十三年（1656），正式确立皇帝大阅制度：“大阅讲武，典之重也。自太祖、太宗以来，举行已久，今请酌古准今，三年一次大阅。阅毕传令大臣并侍卫于御前较射、赐宴。次日诸王贝勒率文武各官上表称贺，以昭大典，著为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此后，康熙皇帝也曾多次下旨称：“国家武备，不可一日懈弛，旧例每岁必操练将士，习试火炮，尔部即传谕八旗都统等豫为整备，朕将亲阅焉。……我朝祖宗开创以来，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伐馘安民，平定海内。今朕上荷祖宗庇荫，坐致升平，岂可一日不事讲习？故朕日率尔诸皇子及近侍卫人等，射侯射鹄，备仪备典，八旗官兵以时试肄。朕常临御教场，历观兵卒，等其优劣，赏赐褒嘉，黜陟劝勉，故尔旗分佐领，各个娴习弓马，武备足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清代皇帝大阅典礼，一般都在北京南苑举行。检阅日，皇帝驾至南苑，总理演兵王大臣及八旗领操都统等率将校军士，穿甲胄出营成列，侍卫内大臣骑而导，领侍卫内大臣二人扈从于后，侍卫班领率豹尾班执枪佩刀弓矢骑而从。皇帝躬擐甲胄，佩腰刀，背囊鞬，骑御马，先试躬，后检阅队伍的列阵和各种武器的操练，阅后赐宴并颁赐官兵等。清前期，除在南苑举行三年一次大阅兵外，有时还在其他地方举行阅武活动。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和二十六年（1687），皇帝曾临卢沟桥亲阅试放火器，特别试验火炮的功能。康熙三十一年（1692）和三十二年（1693），皇帝在京西玉泉山检阅红衣大炮、骑步鸟枪及前锋护军骁骑营兵。乾隆二十八年（1763），皇帝阅兵于畅春园之西厂，宴请各民族来使并检阅健锐营、八旗火器营、前锋护军，汉军枪炮阵法。由此可见，清代皇帝将阅兵视为整顿军纪、加强操练，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即使到了清代中后期，国势衰颓，武备废弛，仍会举行一些操练军队的活动。如本卷所选《神机营合操阵图》（图192）和《武胜新队攻守阵图》（图248附）表现的都是清晚期火器部队列阵操练的情景。

其二、围猎骑射

满族原是游牧民族，以骑射狩猎为生，形成了善于骑射、勇猛善战的特点，其所创立的八旗制度，也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是他们能够击败明朝，创立



帝国的关键。清初，骑射作为考核八旗官兵重要科目之一，是维护全国统治和加强武装力量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八旗上至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下至兵丁，都练就一身骑射的本领。清太宗皇太极曾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清太宗实录》卷三四）他认为习武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出猎行围。入关后，生活环境改变，但康熙、乾隆等皇帝坚持定期到塞外举行围猎活动，即严格贯彻了皇太极的这一谕旨。顺治皇帝对围猎的重要性阐述得十分明白：“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仰荷天休，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嗣后满洲官兵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法司治罪。”（《清世祖实录》卷四八）康熙皇帝也下谕：“一年两次行猎，专门讲武，与行兵无异，校猎纪律，自当严明。”（《清圣祖实录》卷一零六）

当时的皇家围猎场所有多处，大多在今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如吉林围场、巴彥托罗海围场、墨尔根岳洛围场、巴彥喀喇围场、永安莽喀围场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木兰围场（今河北省围场县），这里因距承德避暑山庄和京城较近，且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极好的狩猎之地，在这里举行的围猎活动称为“木兰秋狝”。康熙、乾隆等皇帝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围猎，以带动军士操练。以康熙皇帝为例，他自幼学习骑射，弓马娴熟，又善于火器，除遇国家大事和重要出巡外，几乎每年都要到木兰围场从事围猎活动，一生累计达四十次之多。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六十九岁高龄的康熙皇帝已到了生命最后岁月，仍前往行围。康熙五十八年（1719），他总结自己木兰秋狝收获时说：“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猓獬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之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之人，毕世不能及此一日之数矣。”（《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五）可见康熙皇帝对骑射的重视。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而未能举行木兰秋狝，主要是因为复杂的政治斗争所致，并非他不重视武备。如雍正十一年（1733）即奏准：“每年立冬后，内务府护军，每旗各一日，训练兵二千名，鸟枪兵六百名，分为四日，并上虞处侍卫，鹰狗房执事人等，由内务府总管率领演习步围。”（《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这说明雍正皇帝已经注意到八旗兵士的训练问题。实际上，雍正皇帝在当皇子时，曾常随父皇去木兰围场“骑马、射箭与使用各种火器”进行狩猎却是事实。故宫现在仍保存着雍正皇帝当年用过的盔甲、马鞍、弓箭、火枪等武器装备，本卷亦有收录，从中可以管窥雍正皇帝重视骑射，尚武精神之一斑。

乾隆皇帝时，举行的围猎骑射活动十分频繁。从乾隆六年（1741）至嘉庆三年（1798），他共到承德避暑山庄五十余次。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前，去必行围，就是在花甲之年后，他还照样率领满洲八旗官兵猎捕兽禽。后来由于年过古稀，行围之举才日渐减少。在围猎讲武中，乾隆皇帝不仅指挥满洲官兵奋勇驰逐，擒捕猛兽，而且亲自策马拉弓。曾四次随扈木兰秋狝的军机章京赵翼在《薈曝杂记·圣射》中称赞乾隆皇帝：“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云。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的，九矢率中六、七次，此余所常见。”乾隆皇帝一生行围无数，每有重大斩获，都会写诗记之，并将猎获动物种类、数量刻于所用弓、箭、枪、马鞭等装备之上，有时还命宫廷画家以图记之。如《乾隆丛簿行围图轴》（图13）就是记载乾隆皇帝行围时，与卫士一起擒获四虎的场面。

乾隆时期，承平日久，一些满族王公大臣沉湎于安逸的生活，不愿随行围猎，有的官员甚至进奏暂停围猎，引起乾隆的高度警惕。他下诏说明围猎练武的必要性：“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肆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以宴安，骑射渐至生疏矣。……况今升平日久，弓马渐不如前，人情狃于安逸，亦不同不加振砺。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聘畋游之谓。”（《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乾隆皇帝对一些满洲王公大臣托词不去围猎，甚至无故不到者，严加训斥：“今之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者多矣。不思勇往奋发，而惟耽恋室家，偷安习玩，国势能无衰乎？此等流弊，有关于满洲风气，是以蒙太宗皇帝谅切训谕。朕此次行围，诸王大臣中，竟有耽恋室家，托故不愿随往者，朕已为姑容，亦不必明指其人。夫行围出猎，既以操练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若惟知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嗣后倘有不知悛改，仍蹈前辙者，朕断不轻为宽宥。可遍行传谕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之。”（《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一）

康熙、乾隆等皇帝除了携皇子、皇孙及王公大臣一同围猎外，为了加强军队的训练，还下令驻防各地的八旗军兵也要轮流参加。例如，康熙初年，每年调遣一万二千名八旗兵丁，分三批于三月、十月、十二月，赴口外进行围猎活动。参加木兰围猎的主要是京师、盛京（今沈阳）的驻防八旗，而杭州、江宁、西安驻防八旗一般不参加；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谕兵部，杭州、江宁、西安等地的驻防八旗，每旗都要派人进行随围，以便加强训练。

可以肯定地说，清代前期所举行的这些阅兵、操练、围猎骑射等活动，对训练八旗军队的吃苦耐劳，提高其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康熙年间平定噶尔丹、三藩，雍正年间平定

罗布藏丹津叛乱，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乱等数次重大战役，八旗军兵均能发挥重要作用，是与他们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密不可分的。到了清代后期，特别是咸丰（1851—1861年）以后，同治、光绪、宣统等皇帝都是幼年即位，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力衰弱，那些满洲贵族、王公大臣们多已不习骑射武功，祖宗之法更被遗忘，八旗军兵也丧失了战斗力，围猎活动也就逐渐荒废了。

二、清宫武备的用途

在清代宫廷中，一切活动都以皇帝为中心，一切人员、用品、器物都是为皇帝服务的，武备也不例外。皇帝尚武，经常举行大阅和围猎骑射等军事活动，则宫廷中的武备，也主要是为此准备的。

清朝皇帝举行阅兵、围猎等军事活动，所需一切武备，如甲胄、鞍鞴、刀剑等，都由清宫武备院筹备。如皇帝大阅御用甲胄、弓箭、囊鞬、腰刀等，都是按照典制由清宫内务府承作，而且是为皇帝大阅时专用，平时藏于府库。此以乾隆皇帝大阅甲胄（图2）为例略作介绍，皇帝大阅胄，牛皮胎髹黑漆，顶镂空金龙宝盖嵌珍珠，前后梁鍍金云龙纹并饰以珍珠，梁中饰金刚石螭蛇。胄上植纓，纓顶端嵌大东珠，纓管饰金蟠龙纹，四周垂大红片金黑貂纓二十四条。皇帝大阅甲，由上衣、下裳、护肩、护腋、袖、裆等部分组成。通身明黄缎绣彩云金龙纹，下为海水江崖。甲面有规则的金帽钉。上衣正中悬钢质护心镜，镜四周饰鍍金云龙纹。两袖用金丝编织。下裳分左右，腰以布相连，裳面以金叶片、金帽钉、彩绣龙戏珠纹相间排列。其形制与《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之规定基本吻合。

前文所举是乾隆皇帝御用甲胄，实际上清代帝王每人都有自己的大阅甲胄。这是因为，其一、每位皇帝的体态不同，其大阅甲胄的尺寸自然不同。其二、大阅甲胄的制度因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修改，其色泽、纹饰等都有所变化，到乾隆时期才正式确定下来。如康熙皇帝的大阅甲（图53），其形式与乾隆皇帝的大阅甲相同，但纹饰、色泽及绣法都有所区别。其三、清王朝以“敬天法祖”为其执政原则，下代皇帝对上代皇帝的御用甲胄、冠服等都是珍藏敬收而不服用，并缀以标示，记录哪个皇帝御用，甲胄的名称、质地和镶嵌珠宝数量等。其他如皇帝御用马鞍、弓箭等武备，也是如此。

由于清代皇帝重视围猎讲武，每个皇帝都要使用大批的弓箭、马鞍、火枪等，所以在清宫武

备中，此类物品数量十分可观。在这些皇帝御用的武备中，有的记录着是哪位皇帝使用的，如铜镀金缕缠枝莲马鞍（图14），就附有满、汉文的皮签：“圣祖仁皇帝御用鍍金丝线秋辔鞍一副 康熙二十一年恭贮”。又如圣祖御用桦皮弓（图24），上附二个满、汉文皮签，一个书写：“圣祖皇帝通花面油弓 十一力”；一个书写：“圣祖仁皇帝御用通花面桦皮弓一张 康熙二十一年恭贮”。有的记载着皇帝用此射杀多少只野禽猛兽，如高宗御用金桃皮弓（图26），弓面刻有满、汉文：“乾隆十六年，上在木兰德尔吉围场射中一狼宝弓”、“乾隆十九年，上在吉林围场御用宝弓射中一罴一熊数鹿”。再如乾隆皇帝御用牛角金桃皮弓（图28），弓面上镌刻的满、汉文记载了乾隆皇帝在五年时间内，用同一张弓，射中了十五只鹿、二只麇。还有的记载着皇帝写的诗文，以记录皇帝使用时的情况。如御制“射熊行”马鞭（图17），是乾隆皇帝在围猎时，用弓箭射杀熊时使用的马鞭，为此，乾隆皇帝作了一首“射熊行”诗，由其子永璇书写，再由内务府造办处，将其镌刻于马鞭玉柄上而成。

清宫中还有一些武备，虽然不是皇帝御用，但也和皇帝有密切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八旗兵士所穿戴和使用的盔甲和弓箭。皇帝不论举行阅兵大典，还是围猎以及宫中御园的护卫，都要有数目众多八旗兵丁参与，他们的盔甲均由杭州织造局制作，再由清宫武备院筹备发放，其形式、尺寸都有严格规定，以保证军队装束的整齐划一，以壮军威。据《大清会典》规定，八旗将校、兵丁的



盔甲都是铁质的。兵丁甲为上衣下裳，内衬布，外缀铁叶。最初，八旗兵丁都是穿着铁叶甲参加各种军事活动的，负重较大，行动不便。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为减轻士兵的劳苦，下诏凡在皇帝大阅时，士兵操练演阵不再穿铁叶甲，而穿绵甲，这就开创了八旗军绵甲之制，“八旗额设铁盔铁甲，将三分之一改造绵甲二万件，收储备用，另造不用铁叶绸面金钉盔甲一万八千余副，以备大阅合操之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八旗盔甲都是绵甲，为皇帝大阅时八旗兵丁穿用，如本卷所选八旗盔甲（图62），皆以绸为面，蓝布为里，内絮薄丝绵，面饰有等距铜镀金圆钉，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相符。



最后，这里还要提一提清宫武备中的火器。火器主要指火枪、火炮，明代军队编制中已有神机营，专用火器。清军在进军中原的战役中就曾惨败于明军装备的“红衣大炮”。到了清代，火枪、火炮与弓箭一并被列为清军三大武器装备，为历朝清帝所重视，“我朝武备整齐，弓矢枪炮最为军营利器，法制精良，百世不易。”（《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其中，火枪（因其发机处龙头翘起，形似鸟首又名鸟枪）尤以迅猛准捷，冲锐折坚，携带方便，不受地势限制，而被广泛装备军队，成为清军武备中首要利器之一。入关前，清军武器装备主要以弓箭、长枪、刀、藤牌为主，入关后，顺治朝即成立了专门的鸟枪兵兵种。康熙朝时议定：八旗步兵二万一千余名，其中鸟枪步兵就要占一千七百三十七名。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军瓦代奏请增加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黄旗四旗兵额，每旗前锋各增加鸟枪一兵百名。随着鸟枪兵在军队中的增设，建立一支专门操演火器的军队，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已十分必要。此后，各省营伍不断扩建鸟枪兵，以利实战。康熙朝中期，全国部分省份已纷纷成立鸟枪兵，所拥有的鸟枪已超过五万余支。清前、中期，官兵使用的鸟枪几乎都是火绳枪，火绳枪点火发射装置的主要构件是枪机，发射时，先将机头夹钳的慢燃烧火绳点着，使其成为火源，然后扣动扳手，衔火绳的枪机下砸，火绳头便点燃了火门盒里的烘药，从而引燃管内的火药产生爆炸，将弹射出。由于鸟枪使用慢燃烧的火绳点火，所以可以连续使用而不致熄灭。又由于有了扳机，只要扣动扳手，便可连续点火发射弹丸，因而提高了发射速度，增强了杀伤威力。但火绳枪有一致命的弱点，容易受天气潮湿影响，风雨之际更是无可奈何。道光时期，军队开始部分装备燧发枪和击发枪（俗称铜帽枪），燧发枪是利用火石砸击火镰产生的火星点火发射，而击发枪是用击发枪机撞击火帽而点火发射，由燧发枪发展而来，这种火枪，火门是全封闭式的，彻底解决了火药防风雨潮湿的问题。

可以说，清自入关始，注意加强造兵机构，健全生产制度，严格军品管理，内务则例章程完善。康熙亲征噶尔丹，乾隆建立了“十全武功”，使他们注意到了新式武器——火枪，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所以宫廷非常重视对火枪的收藏，“藏之武库，以记武成”，以此作为赫赫武功的见证。故宫博物院宫廷武备库珍藏有康熙、乾隆御用火枪，其来源一是由西方传教士或皇亲国戚所进献，二是由内务府的养心殿造办处所属枪炮处所制作。这些枪，由皇帝敕命并审阅、钦定，被列入典制，是皇帝专用品。如康熙御用自来火二号枪（图211）、乾隆御用威捷枪（图217）等皆属此列，其特点是造型独特，制作精良，装饰豪华，突显皇家气派。

三、清宫武备的多样性

多样性是清宫武备的一大特点，除了宫廷造办处专门为皇帝制作的武备之外，还有国内各民族、各地方的贡品，以及由其他国家输入的刀、枪、火器等。细观之，清宫武备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清宫武备品类的多样性。清宫武备品类多样，如刀类，据《钦定大清会典图》记载，主要有皇帝大阅佩刀、皇帝吉礼随侍佩刀、皇帝随侍佩刀、王公佩刀、职官佩刀、顺刀、云梯刀、刷刀、挑刀、偃月刀、朴刀、片刀、割刀等。这些不同样式的刀，都有不同的用途：如顺刀为前锋营左右翼用，刷刀、挑刀为藤牌营、汉军、直隶绿营用，宽刃、偃月刀、朴刀、片刀、割刀等为绿营所用。再如木柄枪类，有阿虎枪、长枪、钩镰枪、双钩镰枪、蛇镰枪、十字镰枪、雁翎枪、虎牙枪、火焰枪、手枪、钉枪等，其中阿虎枪为虎枪营所用，长枪为健锐营、护军营、骁骑营、绿营所用。同一类武器，不同军队所用亦有区别。如长枪，据《钦定大清会典图》记载，健锐营所用长枪，通长一丈三寸，刃长九寸，圭首，中起棱，木柄长九尺，围四寸六分，旁衔铁刃如刀，贴于枪下，长一尺四寸，周五分，下缀木圆珠，黑旄，末铁缚长四寸。护军营、骁骑营用的长枪，通长一丈三尺七寸，刃长一尺一寸，釜为铁盘，厚二分，下注朱旄，木柄长一丈二尺二寸，末铁缚长四寸。绿营用的长枪，通长一丈四尺，刃长七寸，柄长一丈三尺，围三寸七分，木质，髹朱注朱旄，末铁缚长三寸。其他传统兵器如矛、戟、叉、镗、耙、钩、斧、钺、铜、锤、鞭、棒、盾等等，举不胜举，本卷专有“传统兵器”一类供读者欣赏，此处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其二、清宫武备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武备。一方面，满族本身就属于少数民族，清宫之中，自然不会少了满族的武备。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满、汉、蒙、藏、回等几十个民族和谐共处，宫廷之中也有许多各地少数民族进献给皇帝的武备。如铁铉金玲珑马鞍（图 72），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七十岁万寿盛典时，西藏地区政教领袖——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献给乾隆皇帝的。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请章嘉国师代奏，要求进京朝觐乾隆皇帝，并祝贺其七十万寿。乾隆皇帝十分高兴，下诏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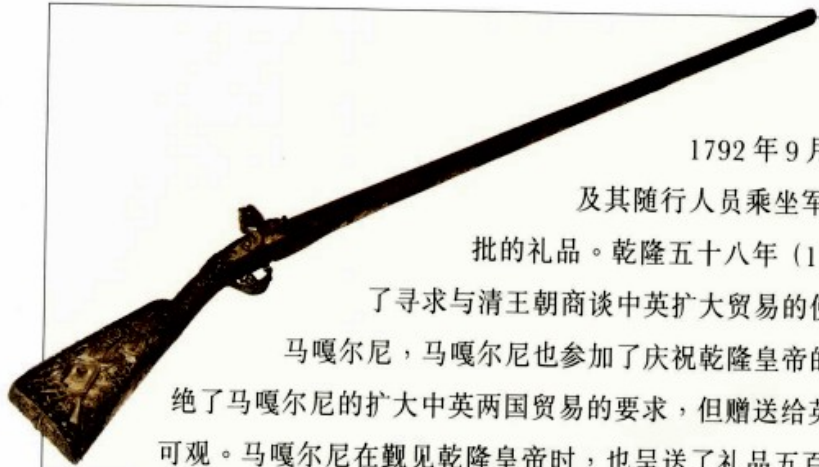


承德避暑山庄外仿照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为班禅建须弥福寿寺，作为其居住和讲经之所。乾隆四十四年六月班禅率众僧及马队两千余人离开扎什伦布寺，经一年多的时间，于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到达承德。乾隆皇帝不仅数次接见和宴请了六世班禅，而且还与班禅一起到须弥福寿寺讲经说法，并参加了须弥福寿寺的开光仪式。六世班禅进献给乾隆皇帝佛塔、佛像、祭祀法器珍贵礼物。这些礼品，是中央政府与藏区的亲密关系和汉藏民族和谐相处的历史见证。

在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武备中，有一件渥巴锡进腰刀（图148）和土尔扈特腰刀（图146），其来历很值得介绍，它们是蒙古土尔扈特部落首领渥巴锡进献给乾隆皇帝的。土尔扈特是新疆漠西蒙古厄鲁特四部之一，长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及其以北一带。明朝末年，土尔扈特首领为躲避厄鲁特蒙古内部的冲突，率本部大部分人员，并联合和硕特、杜尔伯特部分人员，共数万众越过哈萨克草原，远涉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到康熙年间，其游牧地区已扩大到数千公里。土尔扈特虽游牧在数千里之外的伏尔加河流域，但始终眷恋故土。乾隆三十五年（1770），土尔扈特为摆脱沙俄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镇压，在其首领渥巴锡率领下，率部众十六万余人，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征程。渥巴锡率众冲破种种阻碍，历时半年，行程万里，人员伤亡过半，牲畜死亡殆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实现了回归故土的愿望。乾隆皇帝对于土尔扈特的归来十分重视，首先解决土尔扈特归来后的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生活困境，然后为其划定游牧地区，其三解决土尔扈特部落的管理问题，编立旗盟制度。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等人到承德进觐乾隆皇帝，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赏赐渥巴锡等人顶带冠服，敕封渥巴锡为乌纳恩素珠克图尔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其他人等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并数次宴请渥巴锡等人。同时，乾隆皇帝还特意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刊刻于石碑，立于山庄普陀宗乘庙内。乾隆皇帝每次接见和宴请渥巴锡等人，都有大批赏赐，而渥巴锡也向乾隆皇帝进献贡品，其中就包括这两把腰刀。



其三，清宫武备中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武器，如刀、剑和火枪等。刀、剑等多为朝鲜、琉球、廓尔喀（今尼泊尔）等周边国家之物，也有西洋国家的，如英国、荷兰等，也有些兵器还未考证出是哪一个国家所进，火枪则主要来自西洋国家。这些兵器进到清宫后，其中有些又经内务府进行了改装，成为“中西合璧”的武备。在这些武器中，英国人马嘎尔尼来华时呈进给乾隆皇帝的火枪，最有历史意义。



1792年9月，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嘎尔尼及其随行人员乘坐军舰离开英国前往中国，船中还装有大批的礼品。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英国使团来到北京，开始了寻求与清王朝商谈中英扩大贸易的使命。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马嘎尔尼，马嘎尔尼也参加了庆祝乾隆皇帝的八十三岁生日典礼。乾隆皇帝虽然拒绝了马嘎尔尼的扩大中英两国贸易的要求，但赠送给英王乔治三世和使团的礼品数量却十分可观。马嘎尔尼在觐见乾隆皇帝时，也呈送了礼品五百九十件，主要的是天文仪器、机械钟表、自来火枪等。据记载，马嘎尔尼的礼品中，自来火枪有十二支，这种枪的点火方式已不是“火绳”，而是以机械撞机取火的方法点爆炸药，这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燧发枪。在礼品中，还有一种“成对相联火枪二杆”，应是一种双管火枪。此外，还有铜炮、西瓜炮数个。

马嘎尔尼送的天文仪器和先进的西洋武器，其先进性和科学性并未引起乾隆皇帝的重视，而是作为奇巧之物收存在圆明园内，少部分收藏宫中作为观赏之用。可惜的是，1861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这些器物都葬身于火海，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马嘎尔尼的礼品，只有这一把马嘎尔尼进献自来火枪（图228）了。此枪枪管铁质，枪整体镀金、嵌银丝西洋纹饰。枪管镀金处镌英文。从清宫所附皮签上，尚可知它的来历：“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恭进，自来火鸟枪一杆”。

其四，清宫武备中有一批专为皇帝收藏制作的武备工艺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乾隆年间制作的九十把的腰刀和宝剑。乾隆十三年（1748），为宣威制胜、远靖迩安，也为教育自己的子孙居安思危，不忘祖制，乾隆皇帝特命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作腰刀九十把、宝剑三十把，为制作这批武备，耗费的时间和财力都是惊人的。以腰刀为例，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九十把腰刀先由内务府画出图样，再交给造办处下属各机构合作完成。如玉作制作玉把，枪炮处制作刀刃，木作制作木样，雕刻作刻嵌图案，皮作制作皮签和书写满、汉文字，铁镔作制造刀的什件，最后交武备院组装完成。乾隆皇帝对腰刀的制作颇费心血，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从最初的画样、木样，到刀的用料，什件，绞锦、刀鞘、木匣、书写文字以及刀的数量、名称、款识等，无不按其谕旨行事。每完成一道工序，都要由造办处的司库和首领太监交总管太监呈进给皇帝御览，提出修改意见。乾隆二十二年（1757），造办处将先做出的腰刀十把呈进，乾隆皇帝亲自命名为：天字一号练精刀；天字二号叩鸣刀；天字三号孔纯刀（图143）；天字四号月刃刀；天字五号风燧刀；天字六号飞鹊刀；天字七号宿锭刀；天字八号超阿刀；天字九号配威刀；天字十号飞蛇刀。因腰刀是为乾隆皇帝收藏而特别制作的，